

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智库集成

冯雪俊 著

卷三

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汉字流传史

主编—甘晖

副主编—游旭群 周伟洲

丝绸之路

通

鉴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智库集成

冯雪俊 著

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汉字流传史

主编—甘晖

副主编—游旭群 周伟洲

丝绸之路

通

鉴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SK16N11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汉字流传史 / 冯雪俊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6. 9
(丝绸之路通鉴 / 甘晖主编)
ISBN 978 - 7 - 5613 - 8636 - 1

I. ①西… II. ①冯… III. ①汉字—汉语史—西北地区
IV. ①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4783 号

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汉字流传史
XIBEI SICHOUZHILU SHANG DE HANZI LIUCHUANSHI
冯雪俊 著

出版统筹	刘东风
责任编辑	刘 定 王舒涵
责任校对	周 利 杨 珂
装帧设计	杨 柯
封面插图	崔 彬 李文炯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231 千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8636 - 1
定 价	46.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251046(传真)

《丝绸之路通鉴》序一

中国古代有一条历时久远的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通过此道,产自中国的丝、丝织品、陶瓷等物品运送到了以上地区,由于其运送的货物以丝绸制品影响最大,故称“丝绸之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出版的《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和河间地区(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带)、中国与印度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简称“丝路”。这一称谓被学术界和民间所接受,并广为沿用。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依据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把丝绸之路延伸至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

虽然人们在对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坟墓的考古中,已发现了产自新疆的软玉,证明至少在公元前13世纪,中原已开始和西域乃至更远的地区有商贸往来,但是严格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奠定于两汉时期。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由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沿岸各国的陆上通道已经形成,这条通道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经4年时间先后到达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扩大了与西域各国的交往。张骞出使西域,最初主要是出于制御匈奴的考虑,后来则

演变为“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即旨在保护疆域和发展经济。汉武帝曾招募大量商人，到西域各国经商，由此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路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之后，汉宣帝于神爵二年（前 60），设立了直接管辖西域的机构——西域都护府，屯田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以保障西域商路的通畅。随着汉朝在西域设立官员，丝绸之路日渐繁荣，大量丝帛锦绣源源不断西运，同时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输入中原。到魏晋时，东西方商业往来仍然不断，位于丝路咽喉要地的敦煌，就是当时胡商的重要聚集地之一。到公元 5—6 世纪时，中国南北朝分立，但东西方沿丝路的交往却一直没有中断。北魏建国后不久就派使者前往西域，以后中亚各国的贡使、商人常聚集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从事商业贸易。北魏迁都洛阳后，洛阳又成为各国商人的荟萃之地。至隋时，隋炀帝还曾派黄门侍郎裴矩到张掖招徕西域商人，说明当时丝路依然兴旺。

到 7 世纪后，唐代社会的繁荣使西北丝绸之路再度兴旺。唐王朝借着击破突厥的时机，一举控制了西域各国，并在伊州、西州、庭州三地设立同于内地的州县，在龟兹、于阗、疏勒、碎叶设立安西四镇，作为唐朝政府控制西域的机构，驻兵设防，并新修了玉门关，再度开放沿途各关隘。唐不仅打通了天山北路的丝路分线，还将西线延伸至中亚，使丝绸之路更为通畅。当时的长安、洛阳有大量商胡出入，已呈现出国际大都会的风貌。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方商业贸易之路，也是中国和亚欧各国政治、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以及天文、历算、医药等，也通过此路先后传入中国。源于西亚、中亚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以及源于印度的佛教，也通过丝路传入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中国的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绘画

以及儒家、道教等,也通过此路传向西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9世纪末到11世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南沿海转移,加之阿拉伯世界的兴起,东西方海上往来逐渐频繁起来;又由于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政权的分裂、对立,丝路安全难以保障,西北这条陆上通道的重要性逐渐降低,而相对稳定的南方对外贸易则明显增加,遂带动了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成都和泉州也因此成为南方的经贸大城。中国人此时开始将他们发明的指南针和其他先进科技运用于航海,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发展起来。

如果从发展的视角和广泛的意义上说,丝绸之路主要有三条:西北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形成于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不仅运送丝绸,还运送瓷器、糖、五金以及香料、药材、宝石等货物。由于运输货物品种的不同,海上丝路也出现了一些别称,如“陶瓷之路”“香料之路”等。海上丝绸之路早已存在,《汉书·地理志》所载海上交通路线,实为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海船载运的“杂繒”,即各种丝绸。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线可分为东海和南海两支。东海起航线从中国的东南沿海经由朝鲜至日本;南海起航线则从雷州半岛起,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等国,远航至新加坡、印度等地。到宋代时,泉州、广州和明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大的海港,通常将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南方丝绸之路,起点为四川成都,经“灵关道”“朱提道”“夜郎道”三路,进入云南,在楚雄汇合后并入“博南古道”,跨过澜沧江,再经“永昌道”“腾冲道”,在德宏进入缅甸、印度等地。丝绸之路的多途打通,让中国通往西方的商路更得以扩展。这就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向西延伸到了地中海地区,以至可到达法国、荷兰、意大利、埃及,向东

到达韩国、日本。不过,这已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了,可视其为广义的丝绸之路。

2000 多年前兴起的丝绸之路被誉为全球重要的商贸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经济全球化的早期版本。同时,作为东西方商品交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在交往的过程中也加深了沿线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所以它也是东西方友好往来的历史记录和象征。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当世界步入 21 世纪,贸易和投资在古丝绸之路上再度活跃。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的时候,提出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的大合作。这是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公开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的重大战略构想。到 2016 年 10 月,这个重大的战略构想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受到许多国家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9 月 3 日杭州 G20 峰会的开幕式上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此外,2014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阐述中国特色外交理念的时候提出打造人类命运的共同体。2015 年 9 月 28 日,在纽约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阶段,他对这个理念做了系统的阐述,他说:“在联合国迎来又一个十年之际,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 年 10 月 16 日,在世界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阐述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的使命。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习近平主席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思想和论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实现世界和平、发展、繁荣、公平、正义的完整理论。我们需要深入学习、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地处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该校学者积极响应国家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充分发挥学校的学科优势和学者各自的专业特长,撰写了“丝绸之路通鉴”丛书,洋洋数万言,从不同角度阐发了“一带一路”所涉及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正如甘晖书记在《总序》中所说,该丛书之所以取名“通鉴”,“意在借鉴历史,透析现状,着眼未来,贯穿千年时域,探求发展趋势;意在立足中国,深入沿线,胸怀全局,经略万里空间,厘清错综关系;意在研究战略,丰富内涵,解决问题,横跨宏观、中观与微观,打通理论与实践;意在聚焦经贸,关注人文,促进合作,智慧应对世界形势变换,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推进提供全领域、全视角、体系化的智力支撑”。我认为,如果这些想法得以贯彻,“通鉴”一定能够对“一带一路”战略在理论上有较大推进,且为“一带一路”的实施提供有价值的智力支持。

专注于研究“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通鉴”丛书的撰写,需要多种学科的通力合作。“通鉴”正是从丝路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来进行研究,带有鲜明的系统性特点。作者聚焦“一带一路”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观点,可供参考。该丛书第一批出版的著作,就很有分量,既有学术性,又有实践性。其中《英雄在线:丝绸之路的开辟者和捍卫者》《丝绸之路与文明交往》《丝绸之路最早的东方起点:西汉长安城》《天山廊道:清代天山道路交通与驿传研究》等,从不

同角度探讨了丝绸之路的历史；《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汉字流传史》则属于丝绸之路的专门史研究；还有一些是专门研究丝绸之路经济战略的著作，如《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战略高地——陕西经济发展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集群价值网络的演化与重构》《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识别、展示与捕获研究》；而《文化集聚·文化街区·文化地域：重塑丝绸之路的新起点》《丝绸之路上的遗址美术》《汉唐丝绸之路漆艺文化研究》《丝绸之路上的体育交流与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体育文化交流问题研究》，则是关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文化交流史的专门性著作。

相信该丛书的出版，一定能对“一带一路”的理论深化有所推进，一定能对助力“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张先之

《丝绸之路通鉴》序二

2000 多年前,丝绸之路从长安发端,或从秦岭脚下穿越荒漠、草原,横贯欧亚大陆,或扬帆太平洋、印度洋沿岸众多港口和岛屿并蜿蜒至欧洲,跨越不同文化区域,推动华夏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欧洲文明的汇通,实现中西方物质特产和精神智慧的大融合。其波澜壮阔与坚韧竞合的画卷,展现了历史的宏伟与多彩。

千百年来,丝路精神薪火相传,成为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进入 21 世纪,世界步入全新阶段,丝绸之路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期望,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这一重要时点,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并迅速从规划落地为行动,成为重塑中国未来发展路径与发展空间的战略支点。

经世致用,服务国家,“丝绸之路通鉴”丛书应运而生。

一、古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最珍贵的遗产之一

1868 年,德国地理与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对中国地貌和地理进行了规模宏大的考察,发现在古代中国的北方曾经有过一条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大动脉。1910 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学术认证,丝绸之路为世人所熟知。1927 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综合考察,第一次实现了对丝绸之路沿线珍贵文物的发掘、搜集、整理与保管,古丝绸之路的面貌得以较全面地复原。

丝绸之路因运输西方视同珍宝的中国丝绸而得名。考古资料证明,

丝绸之路早已存在,商周至战国时期,中国的丝绸就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运到中亚和印度。

建元二年(前 139),奉汉武帝之命,由匈奴人甘父做向导,张骞率领一百多人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即丝绸之路。神爵二年(前 60),汉置西域都护,屯田于乌垒城,以保西域通道通畅。魏晋时期,东西商业往来不断,位于丝绸之路咽喉重地的敦煌成为往来客商的聚集地之一。5—6 世纪时,南北朝分立,但沿丝路的東西交往却进一步繁荣。隋炀帝时曾派黄门侍郎裴矩到张掖招徕西域商人。唐时则在伊州、西州、庭州设州,在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安西四镇驻兵,保证丝绸之路畅通。

9 世纪末到 11 世纪,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南沿海转移,及阿拉伯世界的兴起,东西方的海上往来逐渐增多。同时,中国西北地区政权分立,丝绸之路安全难以保障,陆上通道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蒙元时期,蒙古西征和对中亚、西亚广大地区的直接统治,使东西驿路再度通畅,丝绸之路又繁荣一时。明清采取闭关政策,虽出嘉峪关经哈密去中亚的道路未断,但陆上丝绸之路已远不如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了。

虽有诸多争论,但大体来看,古丝绸之路主要包括四条路线。第一条是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从中国洛阳或长安出发,经甘肃河西走廊,至敦煌,沿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北麓分三道,越葱岭通往中亚、欧洲和非洲,兴盛于汉唐时期。该路核心段因位于干旱缺水的亚洲内陆沙漠绿洲之间,故被中外学者称为“沙漠绿洲丝绸之路”。第二条是海上丝绸之路,分东海丝绸之路和南海丝绸之路。历史上有三大航线:东海航线由中国沿海海港至朝鲜、日本;南海航线由中国沿海海港至东南亚诸国;西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海港至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周,兴盛于宋元时期。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茶叶等,运回国内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因此,亦称“瓷器之路”

“香丝之路”。第三条是西南丝绸之路。从中国四川成都,向西南到印度,再通往南亚、中亚、欧洲国家。因沿途山道崎岖,又称“高山峡谷之路”。第四条是草原丝绸之路。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部的欧洲地区。因途径之地主要为游牧地区,故称“草原丝绸之路”,又因往来贸易的主要商品是毛皮、金银和茶叶,又称“金银之路”“皮毛之路”。

丝绸之路各线尽管起始时间不同,贸易货品不一,却将不同文明由隔绝孤立推向开放交融,成为东西友好交往的象征。它是人类文明竞合融汇的“搅拌器”,是世界多样性发展的“分离机”。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通过此路先后传来中国,并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的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绘画等艺术,儒家、道教等传统思想,也通过此路传向西方,产生了持久影响。

丝绸之路给中国和其他沿线国家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多年引领和推动下,包含中、哈、吉 3 国 33 处遗迹的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在 2014 年取得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联合申报的形式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丝绸之路项目,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丝绸之路 54 个廊道中第一个成功申遗的项目。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 2016 年 9 月 20 日在甘肃敦煌首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上介绍,在此前陆上丝绸之路申遗成功的基础上,中国正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

二、新丝绸之路在 21 世纪焕发出新的生机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早期版本,2000 多年前兴起的丝绸之路被誉为全球重要的商贸大动脉。岁月变迁,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贸易和投资

在古丝绸之路之上再度活跃。如今,旨在强化东亚和中亚联系的“新丝绸之路”(New Silk Road)概念已经成型,并引起了中、美、印、俄等国的重视。

1990年9月12日,中国北疆铁路与苏联土西铁路胜利接轨。这是继苏联西伯利亚大陆桥之后,第二条连接亚欧大陆的通道,沿途连接40余国,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通道。新亚欧大陆桥的贯通,成为丝绸之路焕发生机的标志性事件,使传播过古老文明和象征传统友谊的丝绸之路再一次焕发光彩。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伙伴关系,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战略赋予了丝绸之路崭新的含义,新丝绸之路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全球高度关注和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亚太主要地区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各自的新丝绸之路构想。

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是对2014年后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主要战略规划,继承和沿袭了美国历届政府的中亚战略,背后隐藏着美国在中亚地区巨大的地缘政治目标和利益,即在中亚地区排除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影响,将中亚国家引向南亚。2011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在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斯塔尔新丝绸之路构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丝绸之路战略,力图在美国主导下形成以阿富汗为中心的“中亚—阿富汗—南亚”交通经贸合作网络,实现这一区域的商品北上和能源南下。这一战略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补充。新丝绸之路战略提出后,美国即着手实施该战略并取得一定进展,但由于阿富汗安全形势不

佳以及融资、地区国家间的竞争、美国地区战略本身的矛盾性以及气源等问题,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2014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在一份政策报告中称,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的一大核心是为中亚建立一个区域能源市场,重点推进“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建设,打造“中亚—阿富汗—南亚”电力网络,打通中亚通往南亚的能源通道。

印度迄今为止还没有清晰的新丝绸之路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有追随美国的意思。印度是美国中亚战略的重要支持者,作为阿富汗重建的第五大援助国,过去10年的花费超过20亿美元。从印度自身来讲,其新丝绸之路规划相对单纯,主要着眼于能源保障和贸易通道。2012年,印度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断电事件,6亿多人受到影响,却无法利用近在咫尺的中亚能源。印度总理莫迪自2014年上任以来,与存在历史恩怨的国家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印度是亚投行的创始成员之一。2015年5月,印度与孟加拉国签署了已搁置40余年的《陆地边界协议》。印度参与新丝绸之路建设的实质动作也越来越多。

2002年,俄罗斯与印度、伊朗联合推出“南北走廊计划”,打算建设起始于印度,途径伊朗、高加索、俄罗斯,最后直达欧洲的铁路、公路和海运等。2010年1月1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共同启动建立推动欧亚经济一体化的“俄白哈关税同盟”,拟建立统一的关税制度。该同盟对“欧亚联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有利于欧亚地区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有利于各地区安全合作框架的构建。2011年10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提出“欧亚联盟战略”,要同独联体国家一同建立关税联盟和欧亚经济共同体,从而推动更高层次的、更广泛内容的一体化组织。这一战略被看作俄罗斯版的新丝绸之路战略。

另外日本、韩国也基于亚欧经济合作提出了丝绸之路构想。主要亚

太国家纷纷推进新丝绸之路战略,一方面预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将面临全新的博弈与竞争,另一方面也表明新丝绸之路具有巨大的潜力和活力。

三、“一带一路”将重新定义中国未来发展空间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阐述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为“一带一路”建设指明了方向。仅仅2年多时间,“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从倡议变成实践,从国家战略落地为国家行动,进入务实合作阶段。从筹建亚投行到成立丝路基金,再到国家开发银行的近千个项目,“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明显进展,获得多方积极响应,不仅为各方在投资、贸易、金融、文化和旅游等领域的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也给沿线各国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从战略上看,“一带一路”将重新拓展和定义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众多学者对此多有著述,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带一路”将加速亚洲和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将成为推动世界持续发展的新重心。“一带一路”战略将成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两翼”,有效连接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东北亚等地区,显著改善区域内的整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状况和营商环境。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亚洲已日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中坚力量。“一带一路”战略涵盖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拥有44亿人口和20多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发挥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市场与合作优势,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亚洲国家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夯实亚

洲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成为推动世界持续发展的新重心。

其次,“一带一路”将打破亚欧大陆长期封闭的状态,中国在推动世界均衡发展的同时将获得新的战略发展空间。亚欧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面积近 5000 万平方千米,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1/3,东西跨度超过 1 万公里,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经济带。“一带一路”将通过打破亚欧大陆长期封闭的状态,带动内陆国家加快开发开放,实现均衡发展,改变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状况,将超越欧美主导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形成推动全球均衡发展的新格局。

再次,“一带一路”将打造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中国将在共同打造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获益。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不仅发展中国家需要实现可持续性的经济转型,发达国家也需要促进经济转型。“一带一路”沿海国家多数精于制造业,而内陆国家资源丰富,能源供给充足,庞大的“中国市场”将为沿线国家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新动力。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沿线会形成发达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通过全方位的国际合作解决自身的问题,更有效地融入全球经济。

最后,“一带一路”将促进人类建设命运共同体,中国将成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一带一路”继承了古丝绸之路开放兼容的历史传统,同时也吸纳了亚洲国家“开放的区域主义”精神,体现了世界各国谋求发展的现实需求。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一带一路”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和战略支撑。“一带一路”不是单一国家的战略,不是把一国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甚至全球利益之上的战略。“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创共享原则,不搞封闭机制,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都可参与,成为“一带一路”的支持者、建设者和

受益者。“一带一路”将加速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构建各方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为各方带来更大发展机遇,共同建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的未来世界。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系统的和平发展战略方针,它将不仅促进经济要素在全球的有序流动和市场的深度融合,而且推进沿线各国的经济政策协调,实现更为和谐的区域经济合作。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战略打开了中国的经贸合作圈、文化合作圈,将大大拓展中国 21 世纪的发展空间。

四、“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带一路”战略勾画出了中国走向综合性全球大国的路线图,在带给中国和沿线国家重大福利和机遇的同时,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同时也充满了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安全风险、企业经营风险、文化冲突风险。

政治风险。首先,政治体制差异大,一些国家政局不稳。“一带一路”战略涉及 60 多个对象国、40 多亿人口,参与国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君主制的阿拉伯国家,意识形态上的相互理解不一定成为根本性的障碍,但从历史看确实会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其次,沿线的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地区政治形势复杂,政局不稳,对政策的连续性有很大影响。此外,一些国家的政治势力出于自身政治目的,有意煽动“中国威胁论”,以阻止或延宕中国战略的实施。再次,大国博弈风险。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当中,不同国家基于不同诉求都有其各自的国家战略,这其中甚至还涉及“一带一路”以外的一些国家的战略利益问题。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韩国等与“一带一路”都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和利益冲突,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事